

酒泉市档案馆新公布一批汉简 ——

从“历史信使”看河西边塞生活

□ 王墨杰

汉代军事后勤的精密运作

在冷兵器主导的汉代,武器装备的完好度与规范化管理,直接维系着边塞防线的稳固。这批汉简中,简001与简008的记载,为我们生动还原了汉代河西地区武器管理的严谨体系。简001明确记录“察姦隧五石具弩一,伤一抚一渊,可缮,弦纬辮完”,字里行间表明对兵器状态的细致检查与记录。

简008的内容更为详细:弭神爵三年,辟神爵四年,姑臧辮卒段安世。这里“弭”和《诗经·采芣》中“象弭鱼服”之“弭”同义,都指弓弩末端弯曲的梢。而“辟”通“臂”,指弩臂,也是弩具的一个部位。“姑臧辮卒段安世”则清晰标注了修缮人的信息——姑臧即今武威,段安世便是当时此地负责兵器修缮的工匠。翻阅其他西北汉简,我们发现这位段安世并非无名之辈,其名亦见于居延新简“元康二年五月己巳朔辛卯,武威库令安世别辮治卒兵姑臧敢言之,酒泉太守府……”结合两处记载可知,他应是汉代河西地区颇具声名的兵器修缮匠人。

从出土实物来看,这两枚简的上部两侧均设有契口,和汉代专用于标识物品的“梲”形制一致。通俗而言,这两枚简便是当时的“物品标签”。据历史学者考证,这样的“梲”或直接系于弩身,或固定在盛放弩具的囊橐之上,确保武器与信息一一对应。“神爵三年”“神爵四年”的时间标注也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为了清晰追踪弩具各部件的修缮脉络,为后续的使用、维护与核查提供明

确依据:“姑臧辮卒段安世”的署名,既有彰显修缮者功绩的意义,更暗含着严格的责任追溯机制——一旦武器在使用中出现问题,可依据署名快速定位责任人,实现有效问责。从武器构件的分类记录,到修缮时间的精准标注,再到责任人的明确署名,这枚小小的简牍构建起一套完整的信息记录体系,印证了汉代在器物管理领域已建立起清晰、规范的运作制度,为研究汉代军事后勤与物资管理制度填补了重要的实物空白。

汉代信用体系的生动写照

除了军事后勤方面,这批汉简还清晰地展现了汉代边塞的法律与信用管理体系,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社会治理的细微末节。

简002的内容和汉代的“考勤记录”有关:六月旦,安乐卒张武不迹;六月二日,当路卒宗相不迹;六月五日,胜道卒孙忠不迹。短短数语,详细记录了不同戍卒在六月不同日期“不迹”的情况。这里的“迹”,特指汉代边防的“日迹”制度——即戍卒每日按规定路线巡逻、探查敌情与异常状况,“不迹”便是未履行巡视任务。这份记录清晰体现了汉代边塞军事管理中严格的考勤制度,展现出当时对边防人员岗位职责精细化的规范制度。

简003则让我们窥见汉代独特的信用管理智慧。简文“戍卒淮阳国夏米里田则,毋所赏卖不贷吏民钱财物”,这看似普通的名籍,却在记录戍卒田则籍贯、身份等基本信息的同时,额外标注了其“没有赊卖行为,未向官吏与百姓借贷钱财物资”的信誉情况。这种将个人信用状况纳入官方名籍的做法,与如今

的信用制度异曲同工,足以证明汉代社会已具备初步的信用管理意识,通过官方记录的方式为个人信用作担保,这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农耕社会,无疑是极具前瞻性的治理举措。

汉代边塞军民的情感世界

这批汉简中散落的私人书信简,为我们悄然推开了一扇触摸汉代边塞军民情感世界的窗。即便部分简牍因千年侵蚀只剩残篇断章,但字里行间流露的真挚情感,依然能凿空历史,跨越千年,触动当代人的心灵。

简013中“入腹必死无疑,累以觚子,如妾在时,自君之子,妾亦何忧”的描述,字字如泣如诉,饱含深情。其中“觚子”即“孤子”,推测这是一位女性写给远方亲人的书信,字里行间既有对亲人的担忧,又有对“孤子”的牵挂。那句“如妾在时,自君之子,妾亦何忧”的喟叹,更是将一位女性的温柔与担当展现得淋漓尽致,仿佛能让人看到她在灯下提笔写信时的深情与期盼。

简025“常在田庐,去时小子,今巨大,于病在……”虽已残缺,文意已难完整解读,但“去时小子,今巨大”寥寥数字,已然勾勒出时光流逝中亲人成长的画面。再结合“于病在”的表述,不难感受到写信人对家人的思念与牵挂——或许是久别家乡的戍卒,在边塞遥想家中孩子从年幼到长大的变化,又担忧家人的健康状况,那份跨越距离的亲情,即使在残缺的文字中,依然清晰可感。

看着这些带着温度的书信简,让我们不禁想起解忧公主的传奇故事。当年解忧公主远嫁乌孙,在西域历经风雨,用一生守护边疆和平。她的故事中既有家国大义,也

有对故土与亲人的眷恋。而酒泉市档案馆藏河西汉简中的书信,正是无数边塞军民情感的缩影——他们或许是戍守边疆的士兵,或许是随军的家属,或许是扎根边塞的百姓,在艰苦的边塞生活中,用文字传递着思念、牵挂与期盼,让冰冷的简牍有了温度。汉代河西边塞从来不止金戈铁马的壮阔,更有柴米油盐的烟火与牵挂挂肚的温情。

汉代民众生活的鲜活图景

除了官方文书与私人书信这一类简外,这批汉简还有用于翻阅的《日书》部分。《日书》是汉代广泛流传的术数典籍,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系统收录各类日常事务的吉凶判断与行事准则,堪称当时民众的“生活百科指南”。在汉代,小到日常饮食、出行方向,大到婚丧嫁娶、农耕时序,河西地区的民众都以《日书》为行动参照,通过占断寻求吉祥顺遂的生活。

简110的上方绘有一幅日廷图,这类带有天干地支的图像在《日书》文献中颇为常见。观察图像,酒泉市档案馆藏汉简日廷图除去标准的二绳、四钩的结构,还清晰绘制着两条线,线的端头分别标注“妇庐”和“妇所向”。“妇庐”即可通假作“妇烦”,特指产妇分娩时头部的朝向;“妇所向”则指产妇生产时身体的朝向。这一记载与汉代常见的生产风俗完全一致,直观地呈现了当时对生育方位的古老认知。

除了生育,《日书》在民众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简017“六日良,可以治食,诸有河者,反受其……”虽后半部分文字残缺,但从“六日良,可以治食”不难看出,这是《日书》中关于饮食的建议;简103“日书可以东西南北行”则表明,民众出行前也会参照《日书》选择合适的方向与时机。由此可见,在汉代河西地区,《日书》已深度



左图为汉代私人书信简,释文为“常在田庐去时小子今巨大于病在”

右图为汉代官方文书简,释文为“趣除天田中沙毋令有譴”
酒泉市档案馆藏

融入民众的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批汉简的公布,让我们得以跨越千年,真切感受到《日书》在汉代河西地区社会的影响力。

酒泉市档案馆公布的河西汉简,虽然仅有135枚,却如同一部浓缩的汉代边塞百科全书。从军事后勤的精密管理到信用制度的细致规范,从军民的真挚情感流露到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每一枚简牍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为我们揭开了汉代河西边塞的神秘面纱。它们不仅是珍贵的文物,更是凿空古今的桥梁,让我们得以跨越千年时光,触摸到那个遥远时代的鲜活脉搏。

敦煌出土的墨书麻纸

□ 赵媛媛 张春生



小方盘城遗址发现的“西汉墨书麻纸”。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一)

按照文物考古的命名规则,这片纸张被命名为西汉墨书麻纸,冠以出土地,也称之为敦煌西汉墨书麻纸。纸面纤维不匀,质地明显要比当代宣纸厚,麻黄色中泛出些许白,铺展开后,麻纸长为3.5厘米、宽2.4厘米,还不到一块饼干大,边缘撕断的纤维经纬交错,如同历史磨砺留下的齿痕。它没有“滑如春冰密如茧”的细腻,有的只是麻丝的质朴与坚韧。

真正让这片麻纸引人关注的是上面

的墨迹——从右至左竖行书写,4行29字,书写工整,墨色如新,墨迹浸润纤维,蚕头力透纸背,属于典型的西汉官方书体风格。经考释,墨书文字为“陵叩頭再口言/君夫人御者下毋/不塞至不陵不口口 /從者景君惠大口”,似为书信。

麻纸上的字迹,直观地证实了当时的麻纸已经可以用于书写。根据与麻纸同层出土的有纪年的汉简判断,西汉墨书麻纸最晚当是汉成帝刘骜绥和二(公元前7年),这要比蔡伦在东汉和帝刘肇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制造并奏报朝廷的“蔡侯纸”早113年。西汉时期,纸张虽然已经发明且用于书写,但应该是受到技术、工艺和原材料以及产品稳定性等影响,并没有实现大规模生产和应用。经历百余年,到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原料易得,工艺简化,实现了纸张的较大规模量产,大大加速了知识的积累和普及。

西汉时期的这封“白纸黑字”家书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想象。写信的麻纸是从哪里得到的?是附近制作,还是上级配发,抑或是自己购买……为什么会沉埋在了玉门关?是驻守在玉门关的戍卒写给远方亲友的信件没有寄出,还是远方亲人寄给玉门关戍卒的家信被珍藏,抑或是玉门关外寄往中原郡县的书信在办理通关手续时遗落在了这里……

想象一下,在河西走廊的尽头,在敦煌的烽燧之下,一位戍卒,或许正借着如血的残阳,就着摇曳的油灯,俯身在这片麻纸上,深情地写着家书。他的指缝里还鬆着塞外的细沙,笔端却流淌着中原的月色,故土的稻香。

(二)

提到纸,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东汉蔡伦的“蔡侯纸”。“蔡伦发明造纸术”的根据,主要来源于中国重要的史书《后汉书》。由于《后汉书》对这一事件的记录非常明确,而且在当时和历史上又具有重要意义和地位,所以在没有其他历史文献为证的情况下,后人便认定是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

那么,造纸术究竟起源于何时?谁是造纸术的发明人?根据当下的研究,有好几项考古发现表明,在蔡伦之前的西汉时期中国就有了“纸”,这两种观点引起了学术界多年的争论。目前,敦煌出土的这件西汉墨书麻纸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明——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有了真正用于书写的纸张。也就是说,并不是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准确地说,应该是到了东汉时期,蔡伦进一步改进了造纸术,他制造出来的麻纸质量更好,更适合书写、使用的原材料也更节省成本,因此,在当时能够实现较大规模的量产。现在看来,那些交织的麻纤维间,分明藏着更确凿的答案——早在公元前7年,匠人们已将麻纸创造成了文明的载体。

近年来,有关专家和学者对敦煌地区玉门关遗址、马圈湾遗址、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麻纸进行了分类整理和深入研究,证明从敦煌地区出土的大量纸文书残片和麻纸,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中,发现两汉及魏晋时期古纸最多的地方,年代涉及西汉武帝、昭帝及宣、元、成帝至东汉初到西晋等。

敦煌出土麻纸数量之大、种类之多、时

代跨度之久,在中国考古发掘中实属罕见。

纸出现以前,书写载体经历了金石、竹木帛等变迁,殷商时期,象形文字刻在龟壳和兽骨上,后世称之为“甲骨文”。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使用削薄的竹片和木片来书写,称之为“竹简”或“木牍”。不过,在竹简和木牍上书写的信息量有限,倘若要博览群书,必得把大量竹简或木牍编链成册,装满一屋子或者几牛车,于是,“汗牛充栋”“学富五车”便成了称赞某人藏书丰富、读书甚多、知识渊博的代名词。

除了简牍书写,那时的人们还在帛或锦缎上书写,但因成本太高无法普及,仅在极为重要的救命文书、要情递送以及家有余金的饶富人家使用。到了唐宋时期,随着书法艺术至臻至纯,造纸技艺也不断提高和细分,最为贵重的要数欧阳修、梅尧臣等文人墨客称赞不已的“澄心堂纸”,这种纸是五代十国南唐时期徽州地区所产的一种宣纸,每一幅长达五十尺,从头至尾匀薄如一,“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南唐后主李煜更是对其爱不释手,命人专门督造,只供宫廷使用,并且将这些纸贮藏在了书斋澄心堂,于是纸因堂名,流传后世。

如今再看那些汉篆烽燧面世的麻纸残片,正是书写载体更替演进的印记。

(三)

目前,文物工作者在各地的遗址中,还发现不少西汉麻纸。

1933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一块4×10厘米的植物纤维纸,质薄、形状已

不完整。同时,出土有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的木简。

1957年,文物专家们在陕西省灞桥砖瓦厂发现一座西汉时期的古墓,经过长期的考古发掘,专家们发现一块面积约为10×10厘米的纸标本,通过化验,证明它是麻类的植物纤维纸。

1973年,在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发现两件土麻纸,一件与西汉宣帝甘露二年木简共存,它的主要材质也是大麻纤维。

1978年,在陕西省扶风县中颜村发现的麻纸,出土于一处西汉晚期的窖藏中。纸片被揉成团状,分别塞在三个铜泡内,外观乳黄色,坚韧耐折,有较好的色泽。展开后最大的一片长、宽各7厘米。经鉴定,与居延宣帝时期的麻纸相似。

1979年,在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七八片麻纸,而最大一片麻纸是西汉宣帝元康年间的。

如果说,敦煌出土的西汉墨书麻纸是最早具有书写墨痕的麻纸。那么,1986年出土于甘肃天水放马滩五号汉墓的西汉麻纸,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纸张实物。纸上用墨线绘有山、川、崖、路、河等,也是一幅世界最早的纸绘地图。根据文物考古专家断定,这是一张为西汉文帝或景帝(公元前179年—前143年)时期的纸质地图。

如今,玉门关的风还在吹,而敦煌西汉墨书麻纸所代表的那种沉默而坚韧的力量,是历史的底色,是风吹不尽,沙掩不了的。它是丝路文明的基因密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印迹,更是时光写给今人的信笺——那些纤维间的墨痕,从来都不是静止的文字,而是文明从未中断的传承。